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2.012

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brought to you by  CORE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跨界采捕与权力僭越·

清代闽船入浙捕捞行为下的官民博弈

陈辰立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海洋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各种海上力量的载体, 海洋社会权力即海上力量利用和控制海洋的权力。在稳定的海洋经济环境下, 官方与民间的海洋社会权力并行不悖, 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 反之, 则产生激烈的动荡, 权力的僭越在所难免。明清以降, 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 以闽船入浙捕捞为代表的跨界采捕活动, 逐渐成为东南海域渔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囿于帝国机构管理制度的缺陷, 以及官方实际操作的不力, 海上捕鱼作业一度得以摆脱官方控制。与此同时, 出洋跨界捕捞成本较高且风险难料,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暂时性的海上社会权力僭越成为民间海上人群用来缓解自身生存困境的变通方式, 具体表现形式包括: 海上盗窃、海上抢劫、盗割渔网、走私米粮等。对于这种现象, 沿海官方系统将其视作海上社会动乱的潜在隐患。而海上暴力事件的频发, 也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 持续出台应对之策, 期望借此维持东南海域秩序。由此, 便在闽浙洋面上演了一幕官民博弈的生动景象。

关键词: 越界采捕; 权力僭越; 闽船入浙; 官民博弈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2-0092-08

作为明清之际王朝海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禁渔令”曾试图将各沿海地区渔民控制在近海作业, 这也导致沿海渔民的生计空间变得十分狭窄。而明代以降滨海人口的不断增多, 令人地(海)矛盾愈发突显。又因海洋渔业受信风、潮汐以及洋流的影响颇大, 季节性地追逐鱼汛成为获得更多渔获的重要手段, 这使得沿海渔民迫切需要冲破“画海为界”的限制。故而“禁渔令”一旦松弛, 季节性的跨界采捕作业随即便会活跃起来, 这就对海洋管理者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自清初展界以来, 闽船频繁进入浙江洋面采捕,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洋面之上渔匪肆虐的情状, 权力僭越频繁发生, 海上社会秩序大受影响。^①

收稿日期: 2017-11-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编号: 09JZD0015)。

作者简介: 陈辰立, 男,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海洋史。

^① 海洋渔业史研究早期受日本学者影响, 注重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展开讨论。参看中村孝志《荷领时代台湾南部之鲷鱼渔业》//《台湾经济史二集》,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5年。而随着学界对社会经济史关怀的加深, 相关成果逐渐丰富。参见曹永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台湾经济史四集》,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6年; 吴智和《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明史研究专刊》第二集, 明史研究小组, 1983年; 欧阳宗书《海上人家: 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年。进入21世纪以后, 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展,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加入, 也让探索范畴不断扩大, 学者们从制度变迁、种群结构、环境因素、分类法则等方面进行论述。关于制度变迁, 参见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年。关于种群结构, 参见陈亮:《国家、技术与市场: 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机构变迁原因研究(1492—1966)》,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关于环境因素, 参见李玉尚《海有丰歉: 黄渤海的鱼类和环境变迁(1368—1958)》,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年。[美]穆盛博著, 胡文亮译:《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关于分类法则, 参见洪纬《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研究(1491—1947)——以福建省为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既有研究深受传统的“陆本”思维方式影响, 对海洋社会动态发展机制研究则缺乏关注。本文拟就清代跨界采捕与权力僭越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进而探索就此引发的官方与民间在海洋权力中的博弈, 以期对彼时渔民生存状态及海洋权力归属做出判断, 以求教于方家。

一、生计所迫：明清以降闽船入浙的渔业传统

闽浙两省毗邻，均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便不乏以渔为生的群体，大约明中叶之后，闽船入浙捕捞现象普遍出现。这是市场供需、王朝制度、海洋环境以及捕捞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明清时期的福建存在着较严重的缺粮问题。一方面，全省范围内的粮食产量难以满足民众所需，明代“虽丰年尚资邻粟”的情况时有发生，至清代依然维持着“南仰粤，北仰温、台”的局面^①。特别是闽南沿海一带，民众缺粮问题尤甚，“漳州府之龙溪、海澄、漳浦、平和、诏安五县，及泉州府属之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四县，土壤瘠薄，堪种禾稻者，仅十之四五，其余多为沙磧，只堪种杂粮，即使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②。另一方面，粮食供给不足，也令其价格水平长期略高于周边省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压力^③。为了弥补粮食不足，解决基本生计问题，出海捕鱼成为了福建沿海渔民重要的谋生手段，甚至可以说海产的丰歉，很大程度上关系着粮食危机局面下福建沿海渔民的温饱及生存。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取得渔获，渔民们也开寻求和拓宽采捕渠道，甚至不惜突破当时朝廷的限制而进行跨界采捕。

其次，官方力量的式微使“禁渔令”难以继续发挥其效力。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④，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福建海陆联防体系基本建立完毕，几乎断绝了福建渔民出洋捕捞的可能。然而，承平日久让海上防御体系“破坏极矣”^⑤，相应配套的水寨、游兵系统更是难以为继，水兵的航海素质也颇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渔民们的御水技艺却与日俱增，“自五虎门抵定海，掠海而过，能行走自如，其技十五；掠竿塘、横山而目不瞬者，技十八；乘风而直抵东涌之外洋，望鸡笼、淡水岛屿如指掌者，惟老渔能之”^⑥。可以想见，如有“老渔”出洋采捕，当时沿海的官方力量将很难阻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禁渔令”名实不符。

再次，不同于近海捕捞，出洋海捕作业需要在（渔）汛期开展，这是采捕有所收获的重要保证。所谓“渔汛”，是指某些鱼类由于产卵、越冬等原因，在一定时期内成群地出现在一定海域。^⑦闽船出洋捕捞的渔获以黄鱼、带鱼为主，据《闽中海错疏》《海错百一录》等古代渔书所载，品质优良的黄鱼和带鱼的渔汛，往往集中在年均温较低的浙省洋面，“……或曰：闽亦有海，而必渔于浙，何也？曰：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凤尾，凤尾在浙江外洋，故福、兴、泉三郡沿海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而北；至春，渔乃渐南，闽船亦渐归钓，从来如是”^⑧，捕捞范围的最南端也仅到闽浙交界一带的闽东渔场。因此，在海禁进一步松弛之后，入浙循汛捕鱼便成为福建甚至粤东潮汕的渔民们每年重要的海上作业内容。

最后，捕鱼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出洋海捕的可操作性。以捕捞带鱼为例，渔民传统作法主要有网、钓、簖取三种，而这些方法更多地适用于近海。而迟至明代中叶，福建沿海渔民便已熟练掌握了深海捕捞带鱼的技法——“纶带”法，即利用延绳钓技术进行带鱼的捕捞，也就是渔行里常说的“钓带”

① 朱维幹《福建史稿》（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476页。

② （清）陈寿祺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二《蠲振》//《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福建第四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③ 参见唐文基《福建古代经济史》“粮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6-534页。

④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壬戌条，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2460页。

⑤⑥ [明]董应举《崇相集·福海事》，厦门大学古籍部藏民国十八年（1929）刻本。

⑦ 张应乾编《农业常识小词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

⑧ [明]董应举《崇相集·护渔未议》，厦门大学古籍部藏民国十八年（1929）刻本。

技术^①。这种钓取作业较之于传统捕捞带鱼技艺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渔具、渔法上的不同,其所捕获的带鱼在体型上也存在着较大差距,“钓取深水者,肥厚而大;网取浅水者,瘦薄而小”^②,可知深海带鱼品质上乘。此外,深海带鱼在上钩之际,往往首尾相衔,钓上一尾便跟一串,效率并不亚于网捕。凭借着这项独门技艺,每到渔期,福建渔民逐渐垄断了闽、浙两省沿海“深海钓带”这一获利颇丰的渔业项目。

在进入晚明后,中央政府内忧外患已无暇南顾,东南一带的沿海社会及海洋渔业发展因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闽船入浙洋面周期性往来采捕趋于常态化,浙省洋面闽船数量与捕捞规模保持着持续增长。王在晋在谈到海防问题时就曾感叹道:“往时闽船不入浙界,故临汛易于稽防,今虽三令五申,而透漏如故。定海关外,船支混淆,商贩莫辨,此可不严界限乎?”^③张岱关于当时普陀山的记载也言道:“寺门伫立,皆四山五岳之人,方言不辨,中多漳州人,绛帻赭衣,是钓船上水手”^④。

明清鼎革,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政策的放开,标志着东南海域经济发展进入到新一轮的勃兴。虽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吏部、兵部曾先后出台沿海捕鱼船只“取鱼不得越出本省境界”^⑤的政令,企图再次限制跨界采捕行为,但实际收效甚微。对此,福建总督高其倬便指出:“查三四月间,福建泉、漳一带及福兴等处渔船并潮州一带船只趁风向浙江、山东一带北上之际,船只最多”^⑥。另据浙江定海总兵张溥在奏折中的统计:“自今正值渔期,有闽省渔船来浙捕鱼,又有江南沙船来浙收鱼,共计约有一千二百余只,自四月初旬起至六月方回”^⑦,足见其规模。

雍正五年(1727年)后,刑部以官方的名义取消了渔船大小的限定,新造大型渔船的应用,使得渔民远距离海上作业能力大为提升^⑧。此后跨界捕鱼规模更巨,性桂以大理寺卿衔受命核查浙江仓库,在奏疏中提及:“窃于八月初四起身,往台、温、处三府察看仓库钱粮之便,各处留心访问。海外港澳并无匪类,只有福建人在此捕鱼为生者不下盈千万”^⑨。从侧面来看,官方已经开始倾向开放对跨界捕鱼行为的限制了。嘉庆年间,官方开始逐步出台对越洋捕鱼的许可政令,“嘉庆九年,浙藩详定,闽省渔船越浙捕鱼,止准收泊镇、象、定三县,查收船照,换给官单;一俟汛毕,缴单换照,驱逐回籍……嘉庆十七年……本省出渔稀少,许往浙江舟山等处采捕;不许越赴江南省,违者治以越境之罪,船只变价入官”^⑩,彼时距雍正初已历数十年。

二、失控边缘:清前期跨界采捕所引发之社会问题

由于关系到沿海渔民的生计,自康雍“展界”以降,闽浙地方管理机构在跨界采捕问题上基本

① 陈亮《技术、市场和资源:明清以来福建沿海的带鱼捕捞》,《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第72页。

② [清]李华修,章朝杖纂《嘉庆连江县志》卷三《物产·鳞之属》//方宝川等编《福建师范大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八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92页。

③ [明]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影印本)。

④ [明]张岱著,云浩点校《琅嬛文集》卷二《记·海志》,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8页。

⑤ [清]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0《吏部·处分例·海防》//《续修四库全书》第8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⑥ 《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渔期福建江南船数目折》(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83页。

⑦ 《浙江定海总兵张溥奏报渔期福建江南船数目折》(雍正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第195页。

⑧ 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第123-124页。

⑨ 《钦差大臣大理寺卿性桂奏报浙江地方仓库钱粮情形折》(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563页。

⑩ [清]周凯修,凌翰等纂《道光·厦门志》卷五《船政略·渔船》//《中国方志丛书》第八十号,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12页。

持默许态度，然清政府官方明确解除禁令却迟至一个多世纪以后，其中的缘由值得思考和讨论。通过对《福建省例》与《治浙成规》的梳理，我们发现跨界采捕行为的确是引发闽浙两省沿海诸多复杂社会问题及王朝海洋管理困境的因素之一。作为一种特殊解决方案，以“海上暴力”为代表的权力僭越行为适时而生。在闽浙海盗式微以后，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僭越仍旧是解决沿海民间社会困境的有效方案，官方“禁渔令”的最终松口，似乎也只是海上各方势力互相妥协的结果。

（一）出海携粮

明清两代福建省内粮食供给依赖于粤、浙两省的输入。不同于近海捕捞“朝出暮归，例不配米”^①的一贯做法，出洋采捕所耗时日较长，渔民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口粮。对此，闽省地方政府有着特别的规定，“每人每日，准给食米一升；如出外洋者，准带一升”^②。待达渔场后，按照规定所携的口粮基本耗尽，必须立刻投入渔业生产，“宁波、台州、温州三府属之民，以米易鱼换货”^③，就此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海上渔业生计模式。

从功能性来看，这个过程除了确保沿海渔民的生产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短期人口转移，局部暂时缓解了福建沿海的人地矛盾。当然，前提必须是渔船按照规定携粮，因为每到鱼汛，往往需要短时间内大量筹粮出海，一旦过量携粮，超出本地承载能力，反而会导致市场粮食短缺，价格上涨，故而官方在限制出洋渔民们携粮数量问题上态度强硬。另一层面，对常年出海的渔民而言，即便是应季循汛捕鱼的“老渔”们，也不能保证所得渔获能够及时到位，并顺利交换口粮。因此，考虑到身处他省，又在外洋之上，虽风险较大，但利用暴力手段以迅速获得救命口粮成为某些渔户的选择之一。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渔民们更倾向于携带较多的米粮以降低长时段海上作业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即便地方政府三令五申“汛口查验放行，不得空船出口，亦不得多带透漏等”^④，携粮过剩问题却依旧屡禁不止。

事实上，江浙虽为鱼米之乡，也难以保证稻米年年都收获丰盈。“今秋绍（兴）属被灾，商民请照赴余势难兼顾”^⑤，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渔民们）请将往浙采捕渔船，每人每日带余米三升之外，再行预带六升，约有两月口粮”^⑥。当年渔汛才毕，晋江县令于从廉便难以再接受渔民们这一要求，上奏书曰“浙省宁绍各属，上年收获丰稔，米粮充裕，晋（江）邑入秋以来，雨泽稀少，米价未贱，民食攸关。现在浙米价即已平减，赴浙采捕渔船，携带食米似属仍循旧例”^⑦，足见过量携米对区域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更多时候即使有多携粮的意愿，地区的供应量也很难跟上。

此外，闽浙米粮因供需不均形成了价格上的差距，一部分闽船便在渔汛过后，利用走水运粮来谋取利益。为此，浙江方面出台相关规定“据实细验数目相符方准出口，倘有浮带即行截留解究，并治奸牙偷漏旗埠贿纵之罪，严参究办”^⑧。虽然，目前还未在档案记录中发现渔船携粮走私的案例，但就该条例的制定可以窥见，于海洋管理并不算非常严苛的彼时，这一有利可图且相对轻松的走私方式是难以被渔民们忽视的，当然也存在着官民沆瀣走水而导致相关案例缺失的可能性。总之，在渔船携粮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涌动的暗流。

（二）渔船油饰

随着清代中叶东南海域禁令的放开，洋面上的船只数量激增，为了严立稽查，靖海洋事，并更好地监督海面不同区域跨界采捕及海上商贸的情况，特别要求“（船只）船头至鹿耳梁头至大桅上截一

①⑧ 《治浙成规》第三卷《浙江省查禁运米出洋章程》//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37页。

②④⑤⑥⑦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往浙捕额带食米》//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05页。

③ 《钦差大臣大理寺卿性桂奏密报前往浙江台温处三府沿途见闻折》（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第564页。

半,福建均用绿油漆,浙江均用白油漆,广东均用红油漆,江南均用青油漆,并于船头刊刻某省县某字号……布蓬、篾蓬俱上书写州县、船户姓名……于船尾刊刻姓名、州县”^①以作区分。个别船只很可能为了走水之便,在如此明晰的管制条例下,依然故意缩小油饰文字,以图浑水摸鱼。为此,该政令在颁布仅数月后,不得不进一步地修订,“蓬上字画,定以径尺……不许模糊缩小”^②。

制定船只油饰要求的最初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监管手段来防止海洋秩序的混乱,因此特别要求进入浙江洋面渔场的闽船,在油饰之后还要配合“投行赴县缴牌换单”,才能开展捕捞活动,以避免由渔入盗(匪)情况的产生。然而实际情况却如浙江定海总督林云在禀报中写道的那样“福建渔船,每年春汛捕黄,冬汛钓带……来至定海、镇海、象山三县地方……书在篷底下截,刊刻字号、县分、姓名,仅仅在两旁舫边,并将姓名间有排在水仙门板上刊刻,更使灭迹。其进口时,将旧蓬移过,仍以遵旧书篷号安分之船。至两旁刻字,或用泥涂抹,或用板遮掩,甚至将水仙门板脱下,则其姓名均难识认”^③。究其原因,一来可以使一些上了黑名单的渔船避过巡哨船的稽查,浑水摸鱼;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洋面上发生非法行为,某些巡哨船也能够以“惟事主无从指报跟缉,而游巡舟师虽梭织哨捕,亦难骤于追获”^④为理由,消极怠政。对于这种阳奉阴违的油饰做法,“省例”文本上除了一再要求基层系统按照管制条例予以贯彻之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应对措施,“海域暴力”事件得以一再逃脱官方制裁。

(三) 异地领证

地方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在政令中明确指出,要求“(船只)成造之时,例取澳甲、户族、邻保甘结,十船连环互保,验明舵水年貌(姓名、籍贯),方准给照行驶”^⑤。船照入编制度是清代船只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按照规定,只有官方登记认可的船只,才具备出洋的资格。对于跨界采捕的闽船而言,这是它们能够进入浙省洋面采捕的首要资质,也是下一个程序“缴牌换单”的核心依据。

相关规定进一步指出,“如有更换,乃赴原给照地方呈明代替,毋许私顶”^⑥,但是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有下级官员指出“舵水人等疾故勤惰,更换非常,或船在别埠,离籍穹远,或船装重载,急欲开行,若概令回籍更名,势必耽误生理”^⑦。就此,嘉防同知舒希忠提供了解决方案,“请照江(南)省海船之例,就地给以官单,粘于照尾,遇有更替,一处禀明查验,守口官员即于单上添注,盖用钤记,以便商民”^⑧,得到当时官方的认同,并以“省例”的形式在福建沿海地区推广执行。

从舒希忠借鉴邻省法令而给出建议的内容与过程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彼时跨省、跨地区海域的商渔活动已然比较频繁,基本上可以肯定已经越及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带;其二,地方上的海洋管理制度在成熟度上并不统一,且缺乏全国性的指导规章,各地区在面临具体事件时,相互参考现象比较普遍。当然,认可这种异地换证的结果,除了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船照登记以外,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对船主频繁更迭现象的妥协,后果必然是此类情状的进一步普遍化。然而,由于当时没有完善的档案存根制度,当地官员对于他处船只的了解,只可能通过片面的船照来获得,导致这一政策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处处掣肘。加之传统社会信息传递时效性较差,一旦买通官员伪造船照资料,就很可能让一些不法船主(水手)或者渔(商)船改头换面,披上合法的官方外衣,从这个层面来

①②⑤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船只如式刊刻油饰书写》//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17、617、616页。

③④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渔船饬令照式书写分别刊刻船户姓名字号》//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22页。

⑥⑦⑧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船只改换舵水就地禀明换单查验》//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20、621、622页。

看，该政策的出台，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令海上非法行为严重化。

（四）商改渔用

清代要求出厂船只明确造册制照，主要是对船只基本使用功能进行界定^①，并根据不同的用途对其外壳进行油饰，以利管理。随着跨界采捕限制的放开，渔船获利颇丰，一些登记为商船的船只开始私下雇佣渔民进行海上捕捞。随着此类船只数量的不断增长，地方政府难以遏制，只得在守住“严私租船只之禁”^②底线的前提下，对这一现象进行规范，“惟是各属商船，每年于春、冬二汛渔期产旺之时，定例原准呈请改换渔照，出洋采捕，与渔船事同一体……亦应照渔船新例，于船篷面背及两旁头尾分别忝刻书写，以臻画一”^③。

事实上，船只职能的改变，不仅对船只拥有者本身以及相应监管部门有较大影响，往往还关系到地区海域经济变动。一旦具有商渔的双重功能，便能够在某些情形下，利用不同的身份进行规范之外的海上操作，从稳定海洋秩序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存在着较大隐忧。为此，地方政令提出了双重监督，“倘有违例船只，务即禁阻出口，解县讯究，治以应得之罪，船只入官。其循环簿内，如有澳甲已填而守口胥役未填、或守口胥役已填而澳甲未填及有填报互异者，其中显有弊实，即行分别严提该澳甲及守口书役究疑通详，并将该管口员据实揭报”^④；以及更为严厉的三级监管，“将逐月所挂出入船只，造册密送该县查核，以杜澳甲、口书串同填报之弊。该县按月汇造册，通送备差”^⑤，试图杜绝这一政令出现纰漏的可能。

顺及，目前尚未见有记载商改渔用船只所直接引发的海上动荡的案例。但必须承认的是，为数众多商船的加入，使得跨界采捕闽船数量激增，这对于纯粹的渔民而言，竞争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生存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加大了他们铤而走险的几率。

三、亦渔亦盗：官民博弈下的海上渔业社群

清人郭仲岳在对浙南洋面“钓带”活动的记载中，曾指出“带鱼，玉环洋面所产，渔民冬时之一大出产也……闽、浙接壤之民多赖此生活，共渔于玉环之坎门。冬钓关一年之收获，所谓鱼盐之利，鱼之重亦若是哉”^⑥，紧接着话锋一转，“信好，则如获丰年；恶，则如逢欠岁。年丰则温饱而安居，岁欠则饥寒而为盗”^⑦。跨界采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闽省渔户的生存窘境，但同时也很可能加速了以抢劫、盗窃、割网等暴力行径为主的海洋社会权力僭越情形的滋生。

早在明末跨界采捕方兴之际，潜在的“暴力行为”便相伴而生。明浙江巡抚张廷登曾在题本中写道“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据昌国把总吴善道报称：坛头下有船一艘，约八十余只，往来行使，未知为渔为盗。既而哨报，系闽中钓带鱼船只，随督官兵堵截，驱逐出洋”^⑧。此后，又在其《请海禁疏》中进一步阐述“细访闽船之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一曰钓带鱼船。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独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官军不敢问……钓鱼船搭厂于山，系船于海。内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乡绅旗号，装载酒米，与渔船贸易，而藏违禁硝磺等物以资贼，每获重利而归，穷海竟同闹市”^⑨。

① 关于清代“船照”原始资料，可参见《（嘉庆朝）福建沿海航务档案》//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五辑第十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②③④⑤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商船改换渔船采捕 照渔船新例一体刊书》//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33、632、633、634页。

⑥⑦ [清]郭仲岳《瓯江小记》//陈瑞赞《东瓯逸事汇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⑧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史料》乙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18-619页。

⑨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张廷登请海禁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3页。

清代对此重视较早的是浙江提督李灿,“水师洋面旧例,冬季扼守撤巡,止有专汛船只。但闽船俱于冬季来浙,以钓带鱼为业,洋汛防范不可不严。臣檄行水师各营于专汛战船之外,另拨快哨船只,配驾官兵来往巡缉,保护商渔”^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所提及的“商渔”并非指越洋而来的“闽船”,而是浙江的本地船只,可见彼时跨界采捕已成浙江沿海地区的潜在暴力威胁。对此,福建本地政书的记载便没有那般含蓄了,“缘闽省渔船,每年春冬二汛往浙采捕案内,竟有出洋之后,或逢渔汛失利,游移为匪,大则行强抢劫,小或偷窃割网”^②。又载曰“乃近闻福、泉各郡仍有等艘船藉捕鱼放钓为名,结伙连踪,或在浙省洋面,或在本省草屿、三沙等处游移窥伺,肆行抢劫”^③。

据安乐博(Robert J. Antony)的观点,此时恰逢中国海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④,同时闽浙沿海一带又是蔡牵、朱濆等海盗集团主要的活动区域。有研究表明,在清代嘉庆年间海盗的来源与成分中,渔民的比例长期以来都是居高不下的^⑤。我们是否可以将跨界采捕与海盗肆虐进行因果层面上的直接关联呢?是不是可以说,跨界采捕所带来的频繁的海洋社会僭越,造就了众多的海上盗匪?

诚然,我们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雷州府志》的一段话却又让我们产生了新的疑虑,“海盗,非别有种类,即商渔船是。商渔非盗也,而盗在其中,我有备则欲为海盗者,不得不勉为商渔;我无备则勉为商渔者,难保不阳为商渔而阴为海盗,久之而潜滋暗长,啸聚既多,遂立帮名抗官军,居然自别于商渔”^⑥。除非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然拥有正当“商渔”身份标签的人群是不会选择将频繁的“权力僭越”行为作为常态化的谋生手段,走到王朝的对立面上去的。

跨界采捕渔船的数量相当之多,清朝当局不会任其肆意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盗。笔者更倾向于穆黛安(Dian H. Murray)的认识“在那些借助海盗活动为糊口手段的人群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渔民,他们除了遇到机会进行一两次冒险以缓解生机的窘迫外,就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了。”^⑦这里穆氏的“海盗活动”实际上就是笔者所谓“海上暴力”,其中的关键词“糊口”“一两次”“冒险”决定了其根本性质,对此行为比较贴切的理解应该是:民间海洋社会为应对海上困境而不得不去实施的一种制度以外的解决方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频率是比较低的。

再让我们看看文本中直接记载的权力僭越行为及其影响下的官方与民间。割网、窃网一直以来都是沿海渔业社会中相当恶劣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对远离乡土的越界采捕船来说,失去渔网所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查得温州府通洋永嘉县渔户张守益等请禁偷网一案……闽省钓艘潜行窃网,亦当设法稽查”^⑧,相应的治理方式则是,“禁在洋买卖渔网,庶偷窃匪船不致藉词狡饰”^⑨,然而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又有了进一步对暴力源头的管控,“一面着落守桁之人赔偿网价,其售买渔网之人,即治以知情盗买之罪,并请将窃网之贼于计赃定拟之外,再分别加以枷号等情稟奉”^⑩。

① 葛全胜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页。

②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洋商各船应照原定章程办理》//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18页。

③ 《福建省例·船政例》之《外洋失事 事主带同舵水赴所在文武不拘何衙门呈报 汛明边缉》//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99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620页。

④ [美]安乐博(Robert J. Antony)著《中国海盗的黄金时期:1520—1810年》,王绍祥译,《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第37—40页。

⑤ 张雅娟《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⑥ 嘉庆《雷州府志》卷13《海防志·上》,转引自杨国桢《从海洋社会全力解读清中叶的海盗与水师》//《中国海洋文明研究》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⑦ [美]穆黛安(Dian H. Murray)著《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⑧⑨ 《治浙成规》第六卷《渔网出口填入照票挂验稽查》//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535、536页。

⑩ 《治浙成规》第六卷《海洋偷网贼匪加枷号收买之人照知情盗买问拟》//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585页。

在具体的过程中，官方的严厉打击与官民妥协也同时存在。“御史奏称：海滨渔户素资网罟之利，向时远出捕采皆所不禁，或不得鱼偶亦为贼。自盗船肆劫以来，若辈通贼获利倍于捕鱼”，为此他提出了，“请将福建渔船小者毋庸置议，其大者带有双桅双篷悉令撤去桅篷，使不得远适，止在海边捕采朝出暮归”，希冀借此避免“暴力行为”出现的潜在可能性，杜绝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然而，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官方又不得不选择妥协。“查两省沿海贫民，藉捕采为生者不下数万家，一旦绝其生计，窃恐所谓无形之盗将尽驱而为盗矣”^①，可以说是通过承认小范围、低频率的民间海洋权力僭越行为的出现，来避免更大规模海洋盗匪带来的社会危机。

笔者认为以暴力手段为主导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的僭越，是解决明清闽浙跨界采捕及其他海上活动中常见的社会问题的民间方案。显然，由于其僭越的对象系官方海洋社会权力，这便对王朝海洋管理制度带来强烈的冲击，而矛盾升级的后果则是职业海盗的出现。当然，海盗集团的肆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僭越下的海洋社会分裂，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帝国通常会利用军事手段的高压，让其流于平息。但更多的时候，简单而直接的权力僭越已经足以应付相应的基层海洋社会问题，故而这种短暂、低频的权力僭越实际上长期存续于海上活动中。

杨国桢先生对传统海洋社会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所讨论的问题“海上渔民社会、船民社会、海商社会视海洋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流动为命根，这是官方按陆地行政区划实施的管理难以掌控的……官府对海洋活动的种种限制，一方面把一部分海洋群体逼回陆地，加剧沿海地带资源和空间利用的陆地化与海洋化发展路径的争夺，另一方面削弱海洋渔业、海洋航运业、海洋商业的活力和应付海洋事变的能力，往往陷入生存危机的窘境，导致民间海上力量与官方海上力量的对立以不可调和的形式展现。”^②

综上所述，暂时性的权力僭越是官方与民间在海上社会长期博弈过程中，于不可调和的态势下产生的，是游离于制度之外的一种解决方案。从本质上来看，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帝国在统治和调试陆海多元王朝疆域的一种暂时妥协与应付之策，这一现象在传统海洋社会的官民之间长期存续，拥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帝制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其发展的态势得以延续与保留。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治浙成规》第八卷《闽浙办理洋面捕盗事宜各条章程》//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30页。

^② 杨国桢《从海洋社会权力解读清中叶的海盗与水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2-153页。

late Qing Dynasty, Wang Tao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Reform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ang Tao’s true image is much richer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re are also several aspects that have been ignored or concealed. Among them, Wang Tao’s writings, compilation, and even publishing efforts in the literary “leisure taste”,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improvement and translation in Western studies, seem to correspond to the two levels “Yin and Yang” that generate his life skills. These writings are not only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Wang Tao’s literary career, but also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by Wang Tao to construct another way of relations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external real world. As a result, Wang Tao’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personal freedom” an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freedom” has made a double imprint of “positive freedom” and “negative freedom”.

An Association Between Essay and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LIN Ling, LÜ Ruohan

Abstract: There must be a natural association between essay and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both essay and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when essayists refer to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Chinese classic drama is not simply criticized any longer in their essay works. On the one hand, essayists have discovered its additional the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 through which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fluence of feudal ideology to fight against feudal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aesthetic properties in itself also adds unique glamour to the arts of essay. The essays that based on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neither interrupt nor disrup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urthermore, it meets the nee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ractice creates a new idea to explore the problem about how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can be changed into modernity and how other traditional arts can adapt to the new era.

Changes of the Taxation Structure of State Farms in Fukien during Qing Dynasty

YANG Yuan-zhang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axation structure of State Farms in Fukien during Qing dynast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ll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Guard and Battalion were transferred to Districts governments. The changes can be seen as follows: the tax authorizes changed from Guards and Battalions to Guards and Battalions, Districts, and Subprefectures, then to both Subprefectures and Districts, and finally to Districts completely. There were some similar cases in other regions.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Fukien caused by the long war between Qing and Koxinga,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Districts gradually took control of the power of State Farms and the system of Guards and Battal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civil.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adjustment of the former dynasty system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of the state system.

Cross-border Fishing and the Arrogation of Power: Game of Official and Civilian in the Cross-border Fishing of Fujianese Boat in ZheJiang

CHEN Chen-li

Abstract: Marine society is the carrier of various maritime force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ower of

marine society is the power to use and control the oceans by marine forces. In a stable marine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marine social powers are in parallel and in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state.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the cross-border fishing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Fujianese in Zhejiang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shery life in the southeastern seas. However, due to the flaw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official operations, offshore fishing operations were once able to get rid of official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the cost of cross-border fishing is high and the risks are unpredictable. A little carelessness will pay a heavy price. The arrogation of temporary maritime social power has become a flexible way for civil marine people to ease their own predicament.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include maritime theft, maritime robbery, slashing fishing nets, smuggling rice and so on. For this phenomenon, the official system regards it as a potential danger of marine society. However,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ritime violence has also caused local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adopt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hoping to maintain order in the southeastern seas. As a result, a vivid scene of the official and civilian's game was played on the Fujian-Zhejiang sea.

When the Missionaries Became Defendants: A Legal History Study of the Woo-shin-shan Case

XU Jun-lin

Abstract: After the Woo-shin-shan Case happened, whether the missionaries invaded the land or not became the focus issu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all parties in China and Britain made different choices in terms of diplomatic consultations and judicial trials. After consulting the lawyers and obtaining sufficient evidence, the Chinese side hired a British lawyer to take the missionaries to the British Consular Court, hoping to defeat diplomatic powers through judicial trials. While the British side, although diplomats often said Chinese could take missionaries to the court, it was more of a diplomatic strategy. In fact, they were more inclined to resolve the case by diplomacy rather than law. So the British diplomats tried their best to prevent lawsuits through diplomatic mediation, but missionaries did not accept unconditional compromises in order to prove their innocence and insisted on litigation. In the end, the court made a compromise decision based on "lex loci reistae", Chinese laws and customs. The trial of this case was not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law, and it was more the result of the game between all the parties. The trial of this case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British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s local practice.

Cultural Formation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n Textbooks Compiled by Wang Hengtong

WU Xiao-Ou

Abstract: Textbook compil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Its name and category,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form and style all reflect the compiler's choice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formation. Since 1893, Wang Hengtong has compiled modern textbooks for church schools with his own strength,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as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ew schools and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With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he carries out life field, language and character,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odern textbooks. Specifically, the modern textbooks take